



农村改革的伟大创造

□ 袁金辉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我国农村农业问题，指出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在此前后，一些农村地方干部和群众自发组织起来，逐步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对农村体制进行大胆改革探索，从而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宏大序幕。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它突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但又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业特点的一种经济形式。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省遭受了百年难遇的特大旱灾，安徽省委在万里的正确领导下，果断决定可以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同时不向农民征收统购粮。这一决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帮助农民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发产生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

安徽凤阳县几百年来就有外出逃荒要饭的历史，在我国农村改革以前，由于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影响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粮食产量极低。小岗村当时共有20户人家、115人，除了1户外，其他户每年都要外出讨饭。1978年12月的一天晚上，18户人家集中在严立华家，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在家庭经营承包的合同上悲壮地按下血红的手印，一致同意分田单干。于是，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第二天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由于包干到户任务更明确，生产更灵活，方法更简单，利益更直接，优越性更大，效益就更高。到年底，小岗生产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这个合作化以来23年中从未向国家贡献一斤粮食的“三靠队”（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1979年包干到户第一年，就向国家贡献粮食65000斤，油

料20000斤，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第一次留储备粮1000多斤。大包干，结束了凤阳人民几百年来讨饭的历史。

回顾安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和发展缘由，除了安徽人民具有穷则思变、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外，其农村改革的起始与成功，得益于万里主政安徽，得益于邓小平等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更是得益于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第一书记后，花了三四个月时间深入农村调研，发现当时农村政策脱离了实际，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于是首先制定了“省委六条”，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之后针对各种改革非议，敢于担当，顶住各种压力支持和鼓励农村改革。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对安徽农村改革给予热情支持和充分肯定，并在1982年1月以中央1号文件形式予以明确。

1980年春夏到1982年秋，是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发展时期。到1983年，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据统计，到1983年末，在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了99.5%。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极大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民乘改革开放东风，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创造性地就地发展工业企业，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使乡镇企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渠道，为我国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开辟了一条独特而成功的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人多地少，一度以来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都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壮大不仅解决了这一棘手难题，开辟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独特城镇化道路，而且还大大推进了我国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工业化进程，可谓是意外惊喜。这正如邓小平所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

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苏南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以无锡为例，在近代，无锡是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改革开放时期，无锡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先行者。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无锡的乡镇企业在全国率先崛起，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2017年更是迈入经济总量万亿俱乐部。华西集团、万象集团、红花集团等就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和缩影，其实不仅仅是无锡，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现有企业八成以上都脱胎于乡镇企业。

继苏南模式之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等都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成功范例。草根工业的异军突起，体现了我国农民的聪明智慧和创新能力，更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正确决策。1984年3月，中央四号文件《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通知，将社队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正式统称为乡镇企业。199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标志着我国对乡镇企业的规范和管理逐步进入法制化轨道。

（三）

村民自治与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我国农民的三个伟大创造。村民自治的萌生，是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逐步实施和推广，给延续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巨大冲击，从而使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农村基层民主形式得以产生。

1980年春天，广西河池合寨村的20多位壮族农民，组织村民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村委会。合寨位于三县交界之处，历史上社会治安就一直不好，加之人口较多，辖区较大，当时有1050户4298人分布在12个自然村，导致农村社会管理压力大。面对日益恶化的农村社会治安，果地和果作两个自然村的村民率先自己组织起来。

1979年底，果地村以选举社会治

安带头人的方式，选举蒙光新和蒙成顺二人为村里的治安带头人。二人当选后不负众望，多次组织召开老党员会议，制定村规民约，发动村民治安联防。并在1980年1月20日召集全村16岁以上的村民500多人，开会讨论事先草拟的村规民约并让每户代表按手印确认，以便人人负责，自我约束。邻近的果作村在建立自己的组织时更规范一些，1980年2月5日，85户代表选举韦焕能等六人为村领导，并随后讨论确定“村委会”为新的组织名称。之后，新当选的村委会带领村民讨论制定了村规民约和自我管理章程，并在7月召开全村大会予以讨论通过。村委会的成立和村规民约的顺利实施，使壮族村寨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小偷小摸没有了，打牌赌钱减少了，滥砍滥伐停止了，村民又过上了安宁祥和的生活。

果作村委会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有正式记录的第一个村委会，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自治功能，坚持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等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果地和果作的壮族村民出于维持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需要自发组织起来，更没想到他们自己讨论形成的村规民约竟然酝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诞生。

果作村民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引起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罗城和宜山两县党委政府充分肯定了这些自治组织的作用，并在1981年春天将这些自治组织的名称统一为“村民委员会”。1981年下半年，全国人大就派出调查组对广西河池一带出现的村民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后给予肯定。1982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之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推动和领导下，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一项有效形式得到了全面推行，这不仅扩大和保障了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利，而且促进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党史事件

十八大以来加强党性修养的历程

□ 李建红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所肩负新的历史任务，全面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全面从严治党迫在眉睫。党性修养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梳理十八大以来其发展历程，对今后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总结经验和探索规律很有现实意义。

以解决“四风”问题为起点，强化作风修养和理论修养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党员、干部的作风直接体现着党风，关系着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的稳固，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转变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工作作风，认真解决反腐倡廉中的突出问题”，把加强党员、干部作风修养作为反腐倡廉的突破口。在此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审议通过了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为党内预防腐败和加强党员、干部作风修养提供了遵循。

党员干部提升作风修养必然要在实践中锻炼，其质量如何要让群众来检验。为此，中央决定在全党自上而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要让党的领导干部为全体党员作

好示范：在活动中锻炼作风修养，在活动中走向人民群众，在群众的监督下改进作风问题，在实践中锻炼中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打破阻隔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不良作风“围墙”，针对存在的问题洗洗澡，治治病。

加强党性修养还必须与坚定理想信念、增强理论修养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到，党员干部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才能用更长远的眼光思考党和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

制度与思想同时发力，增强纪律修养和道德修养

党的制度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经验教训及优良传统作风。而党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党章，作为党的总章程和总规矩，它是党员正确认识和行使权利，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其他法规制度建设的基础和依据，全党必须一体严格遵守党章是其他党内制度建

设的首要任务。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其效果体现在能否守好纪律和规矩上。新形势下，部分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还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强化制度的生命力，党员、干部的纪律修养必须要跟得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党员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做到“五个必须”：在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党员、干部自觉加强纪律修养，首先从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开始，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党员增进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同各种反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道德修养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主义道德作为党员道德的最高准绳，对于帮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增强道德修养必须重视家风建设。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中，就专门要求党员自觉作良好家风的表率、提升道德修养境界。

强化党内监督，净化政治生态，确保党性修养成效

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最终还

是要落在对政治生态的治理上。这是因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相反，不严肃、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也是党内存在问题和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出现问题的根源。因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可以说是解决党员、干部作风问题，严明政治纪律和规矩，坚定理想信念，强化道德底线，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最为重要和有效的载体。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等相继出台，对党员、干部如何带头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政治、组织纪律修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清正廉洁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这一系列制度的出台，指明了党性修养的日常路径，为规范党内生活提供了依据，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进一步提升党性修养质量。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普通而又特殊的共产党人：扛起钢枪是一名勇猛的士兵，拿起锄头则是一位农事娴熟的农民；他将信仰铸就在血与火的战场，又把初心播撒在田野山林；他用一生践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承诺——只要是为了人类最崇高的事业而奋斗献身，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得失和身份。这个人，就是共和国开国将军甘祖昌。自从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戎马倥偬29年，他南征北战，英勇奋斗，数受重伤，屡立功勋，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然而，仅仅两年后，他却毅然解甲归田，带着全家回到老家——江西省莲花县坊楼镇沿背大队桥头村，种田当农民，造福老百姓，这一干又是29年，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农民到将军，枪杆见情怀；将军到农民，锄头映初心。甘祖昌用一生鲜血谱写出对党的无限热爱，用全部生命捍卫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不计得失，忠于党和人民。有几分热爱发几分光，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对党忠诚老实”，甘祖昌没有豪言壮语，却始终在身体力行。无论是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和“南征北返”突围战斗，以及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历次重大战役战斗的29年革命生涯，还是回到农村矢志带领乡亲们艰苦奋斗、改变落后面貌的29年建设岁月，甘祖昌把对党的无限忠诚植进骨髓、融入血液，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革命信念始终如一。1951年，在一次下乡检查工作途中，因特务破坏桥梁导致车祸，使甘祖昌的头部再次受伤，加剧了战争时期两次头部受伤留下的严重脑震荡后遗症。他深感自己不再适合做领导工作，多次拒绝到风景名胜区休养的组织安排，毅然从高位请辞回乡务农，以从事体力劳动的方式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贡献。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投身家乡、奉献乡梓，甘祖昌对党忠诚，永葆初心，把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光热毫无保留地散发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路上，以实际行动为自己的信仰追求做了最好的诠释。

不图享受，甘于艰苦奋斗。共产党人追求的，是让人类得到幸福，而非只为一己之私的小富即安。甘祖昌始终与党同心同德，积极响应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同志提出的关于“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创办枪械修理所、子弹厂、兵工厂、纺织厂的精神，不恋高位不图享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携妻将子解甲归乡。并且极力劝退为其配备的保健医生、警卫秘书，从村前村后拾粪开始，数十年如一日，除了生病、外出开会，就是开荒地、改造农田水利、修建水坝电站，几乎天天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干劲极大，休息极少。当时组织上每月发给甘祖昌工资330多元，但他生活俭朴，养猪种菜，并给自己立规：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食物，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服。却对公事毫不吝惜，累计支出达85000余元之巨。上级在生活上要按有关规定照顾他，盖房子、配汽车……他都一一拒绝。不仅不搞任何特殊化，反而自己花钱在村里盖了几间简陋到连窗户玻璃都未安装的农舍。死后留给妻儿的唯一遗产就是一只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着他1955年荣获的3枚勋章。

不忘初心，勤于造福百姓。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然而，建立初心不难，难在一以贯之地坚守。正如他的夫人、曾先后两次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并深情称作“老阿姨”的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老人所说的那样：“老甘最大的信念就是带领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让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日子。”甘祖昌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吃饱肚子，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郑重承诺。一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下定决心：“只要我的心脏还能跳动，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一定为建设一个幸福的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脱下军装便和农民兄弟吃住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一如当年带兵打仗一样，从未视自己高人一等，并将自己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用于帮助群众购化肥、添机械、建学校、办企业、救济贫困户等。正是他关心群众，不摆架子，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家乡的父老乡亲才发自内心的称他为“祖昌兄弟”，亲切地称他为“祖昌兄弟”“祖昌伯伯”。回乡29年，他白天参加勘测设计，晚上钻研农业科技，和乡亲们一起深入实际、同甘共苦、呕心沥血、辛勤劳作，共修建水库3座、水电站4座、渠道25公里、公路3条、桥梁12座，为家乡群众过上幸福小康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用为民谋利诠释践行了自己的赤诚初心。

不徇私情，严于律己治家。共产党员也有七情六欲，如何做到公私分明，是对每个共产党员党性原则最现实、最基本的考验。甘祖昌虽然劳苦功高，但从不居功自傲，坚决反对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他对亲属子女一贯严格要求，经常教育他们要有革命后代的责任感，而不能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在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职务的同时，他将妻子龚全珍的军籍公职也一并辞去，一同返乡。1950年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他将堂兄儿子带到新疆读书，却把亲生儿子留在了家乡务农。大儿子甘锦荣因身体瘦弱，在家乡干篾匠活上山砍竹子吃力，在甘祖昌母亲的要求下找到新疆，可当甘祖昌得知儿子在家乡会打铁时，毫不犹豫地就将其安排到了打铁厂干锻工。返乡之时，又毅然决定当时可以继续留在新疆工作的甘锦荣夫妇与他一同回到农村。1976年老伴龚全珍从教育工作岗位上离休，按照当时规定可由一个子女顶替，甘祖昌坚决反对子承父业的旧规矩，认为子女长大应自谋出路而非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最终阻止了四女儿甘吉荣去学校“顶班”。

□ 甘守义

甘祖昌：锄头映初心